

# 严家显与黄历的省农学院

邓家棠

抗日战争时期，省会迁来永安山城。1940年初福建省政府筹办省立农学院于黄历，严家显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

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岁月，创办学院的困难艰苦是可想而知的。学院的一瓦一椽之营建，一事一物的安排，无不煞费苦心，正如严家显院长在第一届毕业纪念册序言中所写：“溯余来主院务，四更寒暑，受命于战时肇创之秋，着手维艰，用心良苦，谬以先觉自期，窃抱乐育之志，敢辞劳怨，但矢精诚……”。这也表明了他当时的思想境界。他热爱祖国、热爱学生，以培养农业科学人才、献身教育、振兴中华为己任。他面对荒山僻壤，惨淡经营，终于建成农业高等院校。农学院初办时设农艺、园艺、森林、农业经济、农化土壤、畜牧兽医、植物病虫害等七个系，至1942年调整为农艺、园艺、森林、农业经济、植物病虫害五个系。

严家显上任伊始，首先抓两件大事。一是想方设法延聘知名的专家学者来院任教，其中有包望敏、程世抚、周明胙、张彬忱、骆君驊、林传光、陈振铎、李先才、李凤荪、周昌芸、卢润孚、张效良、裘维藩、金德祥等。当年上课没

有课本，只依靠老师的讲授提纲作课堂笔记，并根据老师指定的参考书目在课外阅读补充。由于本院图书馆藏书充实，保证了正常活动的进行。其次，是竭尽全力抓设备。在他的努力下，农学院的设备较为齐全，有生物理化实验室及各系实验室和研究室。农场、畜牧场、园艺场等设备良好，如当时拥有四架最新式的手摇计算机，数十架显微镜，有种子室、昆虫室和三座大型的温室。这些设备器材，很多是从当时已成为“孤岛”的上海采购，冲破重重封锁，千辛万苦运回来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当年有位英国学者来黄历访问，他认为：“福建农学院作为一个高等学校，在战时能办成这样规模和拥有这样的环境，是值得赞许的。”严院长治学谨严，他扎扎实实抓教学实验，还根据情况，亲自在课外帮助同学补习英语，学习拉丁文，从各方面提高学生素质，培养艰苦朴素、勤俭好学的风气，因此教学质量是上乘的。1943年，教育部在重庆举行全国农业院校毕业班学生的几个学科会试，当时农学院还没有四年级，派出三年级三名同学前往参加，结果都名列前茅，受到瞩目。农学院许多同学在严院长和教师培养下，成为对祖国、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如美国的敏尼苏达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新疆八一农学院、特别是台湾大学、台湾中央大学都有福建农学院校友担任教学或重要工作，在农业科研上作出一定贡献，又如第一届毕业生薛承健同学在美国获得博士后，他的森林营造和木材造纸的研究成果，饮誉国际；这与母校老师的培养和母校的优良校风，以及“黄历精神”的熏陶是分不开的。这里所说的“黄历精神”，可归纳为三句话，一是勤学苦练的基本功，二是艰苦创业的干劲，三是团结进取的精神。

黄历的农学院在永安曾演出不少宣传抗日救国、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醉生梦死的话剧，其中有邵荃麟的作品《麒麟寨》和曹禺的《雷雨》、《日出》以及宋之的的《雾重庆》等大型话剧，对永安话剧运动作出一定的贡献。

#### 附：严家显先生一家

严家显先生，1931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昆虫系，后赴美国敏尼苏达大学留学，获得昆虫学博士学位，因学业优秀，荣获过两把“金钥匙”奖。抗日战争发生后，严家显先生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到祖国。

严家显先生夫人王祖寿女士原籍福州，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她在抗战时随同其夫来永安，也在农学院任教，后来随严家显先生去重庆复旦大学农学院工作，抗战胜利后又随复旦大学复员回上海至今。王女士现任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常委，徐汇区九三学社副主委。1952年，严家显先生在复旦大学任教授，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科学院昆虫系主任，因病不幸逝世。王祖寿女士把五个女儿抚育成人，现在大女儿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二女儿在美国获得电脑博士学位，三女儿在丹麦留学二年，现获上海交通大学海洋电力博士学位，四女儿在美国获得电脑硕士学位，五女儿正在美国留学。

严家显系严家淦先生堂弟，他俩从小都在苏州桃坞中学读书，都是高材生。他俩感情很好，无所不谈，有事互帮。严家淦在永安任财政厅长时，介绍严家显来永安任农学院院长。严家显家曾三度住在严家淦家中，同吃一锅饭，特别是严家淦夫人刘基权对家显家人照顾得很好。王祖寿在黄历生第一个孩子时，孩子的衣衫都是她帮着准备的，每次坐月子

时，基权经常来家显家看祖寿，如亲姐妹一样。严家显去重庆复旦大学上任，当时物资供应困难，为了筹备路上的干粮，基权通宵达旦，连夜为家显全家烤制干粮。严家淦非常关心福建农学院，他经常从渔潭或茅坪驱车到黄历巡视农学院，看望家显，曾两次来农学院作学术报告，探讨大豆化学问题。

抗美援朝时，严家显响应祖国的号召，从事反对美国细菌战争的研究工作，他欲带病从戎，不幸在整装待发前夕，因癌病突发，医治无效逝世。病发时，他还嘱其四弟病理学家严家贵代兄从戎。1988年10月，黄历农学院部分师生，为纪念已故首任院长的功绩，由海内外和港台校友捐建一尊严家显半身铜像，置于福州金山农学院，也寄意海峡两岸校友，加强联系，同心协力，为振兴中华农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 回忆万桢先生和永中歌咏团

章良猷

离开吉山母校永安中学已经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来，那块夹在山麓溪旁，在青少年时代哺育过我的土地，那在抗战时期度过的中学生活，时时勾起我记忆的丝缕。而常常萦回于我的脑际的是当年回荡在校园里歌声。

这些熟悉的歌声首先使我想起我们的音乐老师陈万桢。那时，我们管老师叫先生，称呼时不用姓只用名，所以大家都叫他“万桢先生”。大概是这样叫惯了吧，现在我还觉得叫“万桢先生”要比“陈老师”更亲切一些。

万桢先生1941年来永中，1945年离校，在他执教的这段时间，永中的音乐教学显得特别活跃。他体弱，还患有肺结核，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犹如现在的癌症。但凭着他对音乐教育事业的热爱，他孜孜不倦，数年如一日，一个人承担着全校高初中各班的音乐课，用全部心血浇灌着永中的音乐园地；他传播音乐知识，使我们窥见了音乐殿堂的一角，引发了我们对音乐的爱好和兴趣。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是抗战时期在永中的音乐教育园地上辛勤耕耘而成绩卓著的一位杰出的园丁。

万桢先生有一付出色的歌喉，声音浑厚而又明亮。他更

弹得一手好钢琴，一曲曲优美的旋律从他在键盘上飞舞的手指间流淌出来。一个又会唱歌又能弹琴的音乐老师自然受到同学的欢迎，一周两节的音乐课成为最吸引我们的时刻。

教唱歌是音乐课的主要内容。他教了我们许多抗敌歌曲，这是那个时代的时代呼声。《睡狮》、《八百壮士》、《太行山上》、《长城谣》、《思乡曲》，还有陆华柏的《故乡》等等，有的歌声雄壮，有的比较抒情，它们都激发人们同仇敌忾的感情。抗战已成为历史，但这些歌曲是难以忘怀的。

除了抗敌歌曲外，万桢先生也教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名歌。那些二三十年代的歌曲，使我们了解五四以来的音乐传统。我们唱过李叔同的《春游》和他填词的“长亭外，古道边……”；我们也唱过黄自的“花非花，雾非雾”，“秋色近，起西风”等等。现在电台播送的“五四以来的优秀歌曲”，绝大部分就是当年音乐课上曾经唱过的。万桢先生教我们唱德沃夏克的《念故乡》、勃拉姆斯的《摇篮曲》、鲁宾斯坦的《春来了》这些外国名歌，把我们带到更加广阔的音乐世界。

在永中唱过的歌当中，现在最令人难忘、最教人动情的一首歌是卢前作词、黄自作曲的《本事》。这首小歌是卢前到福建音专来任校长后在永安流传开来的。歌词只有几句“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这首歌几乎人人都很喜爱，当时只觉得它悦耳动听。而在长大以后，尤其是老了以后，一唱起这首歌就不由得引起往事的回忆，仿佛回到了四十多年前哺育过我的土地。现在每当我们老同学聚会回首当年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唱起这首《本事》，把我们对永中生活的怀念寄托在歌声里，卢前自己有诗云，

“闻君歌本事”，“使我九回肠”。这首歌确实有这样的魅力。

万桢先生教我们唱这些歌是一种美育的熏陶。它逐渐地，在无形中，提高了我们对音乐的鉴赏能力。那时，在抗战后期，来自上海的所谓流行歌曲已在社会上流行起来。但是这些格调低下的靡靡之音，在永中校园里没有它们的市场。这不能不说是万桢先生平日的音乐教育潜移默化的效果。

音乐课程除了教唱歌外，万桢先生还教我们乐理和音乐的入门知识。我们不但学简谱，也学五线谱。我现在看到五线谱上几个升号和降号还能够判别它是什么调，“多”在第几线或第几间，就得益于他当年的教导。在音乐课上万桢先生还给我们讲什么是“朔拿大”（当时还没有译成“奏鸣曲”），什么是“交响曲”；管弦乐用什么样的乐器——由于学校的乐器仅有一架钢琴，我们只能从图上来认识“巴松”和“奥博”。

现在，中学生活已经过去几十年了，音乐课学过的东西大部分似乎还记忆犹新。这几年，我见到不少已经两鬓如霜的老同学，他们都众口交赞在永中所受的音乐教育。他们现在不管是医生，是工程师，还是教授，对那些年学过的陈年老歌，都还能“朗朗上口”。我想，当一位音乐老师知道他已经把音乐植入学生的心灵以致终生不忘的时候，他一定会感到莫大的安慰吧！

万桢先生来永中后，为了提高同学的音乐水平，还组织成立了永中歌咏团。

永中歌咏团规模不大，只是一个二十多人的集体。成员是万桢先生从全校高、初中年级的同学中挑选出来的，可说是集中了永中唱歌的精华。从一个普通中学的歌咏团体来

说，它的整体水平是不算低的，而其中还确实有一些颇有天赋的尖子。如胡永祚，标准的男中音，声音宽厚洪亮，音量之大说他是“以一当十”，决非戏言。张仁祥，是歌咏团数一数二的女高音，音色圆润柔美，她在一个老师自编的话剧中独唱《姑娘，你十八岁了》（陈万桢作曲），现在还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欧阳端、张霞笙等等，也是团里的佼佼者。

歌咏团主要是排练合唱，平时每周练习一次。每逢练唱，很少有人无故缺席的，用现在的话讲，团员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很强的。那时没有“动员”，也没有什么“思想工作”——大家出于共同的兴趣和责任感，很自然地都按时来参加练唱。这样一个集体，既有一定的素质，又很齐心，加上万桢先生严格的指挥和训练，永中歌咏团的水平，在当时的永安，除了福建音专外，恐怕就要数它了。

歌咏团每学期总要举行一次音乐会，向全校汇报练唱的成绩。每逢这一天，台上挂起汽灯，台下师生济济一堂，我们既忙碌又高兴，就象是歌咏团的节日一样。最兴奋的当然是万桢先生了。到我们的大合唱出台时，他手持指挥棍，时而有力地时而柔和地挥动着手臂，左手还不时给各个声部发出提示，再配合脸部的表情，显示出娴熟的指挥艺术。后来，万桢先生选择合唱指挥作为他终生奋斗的事业，这一志愿也许就滥觞于永中歌咏团吧！

歌咏团的合唱确实还有一些水平，如《满江红》、《旗正飘飘》、《保卫黄河》、《我所爱的大中华》这些歌，虽然我们人数不多，但还是能达到相当的力度，烘托出应有的气氛。一些有相当难度的歌，象清唱剧《长恨歌》的几首选曲，唱的效果也不错。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哈利路亚》，亨

德尔的传世杰作《弥赛亚》中一首最著名的合唱曲，这是我们第一次用英文来唱的合唱歌曲。这首歌万桢先生用了不少时间教我们练唱，演出时大家唱得都很卖力。那次音乐会可说是这首世界名曲在山城永安的首演。那天晚上，音专的一些同学来听我们的音乐会，对我们唱的《哈利路亚》颇为赞赏。得到音专老大哥的褒奖，可以想见我们该有多高兴了。

音乐会上还有独唱、重唱节目。象张仁祥和张霞笙的女声二重唱《杜鹃》，她们俩配合和谐，当唱到“归去，归去”的时候，真象是杜鹃在声声啼唤。欧阳端的《我住长江头》，当时也是脍炙人口的。现在电台时常播这首歌，象是条件反射，每当听到它就会联想起她演唱时的样子来。

学校老师也参加我们音乐会的演出，因此它不管是师生联欢会。有两位刚从厦大毕业来永中的女老师，一直和我们一起练习合唱，也一起参加演出，无异就是我们集体中的成员。在音乐会上还有老师的独唱、师生合作的四重唱，而万桢先生的钢琴独奏和徐志德先生的小提琴独奏是最叫座的节目。徐志德先生原是在福建音专教小提琴的，他的小提琴加上万桢先生的钢琴伴奏，真可谓珠联璧合。许多西洋古典音乐的曲目：《军队进行曲》、《圣母颂》、《梦幻曲》、《小夜曲》等等，我是从他们的演奏中才第一次听到的。他们的演奏吸引不少音专的同学专程从上吉山到下吉山来听我们的音乐会。

我参加永中歌咏团的活动整整三年。这个超乎班级的集体，在我的中学生活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现在，当年在一起引吭高歌的团友们已都天各一方，有的已不幸作古。那一幕幕曾经带给我们欢乐的高吟低哦的场景，只能在回忆中去追寻了。

在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我向现在虽已退休，但仍在担任一个合唱团的指挥、继续奋斗在音乐战线上的万桢先生，祝愿他事业成功。我也向永中歌咏团现在天各一方的团友们真挚地问候。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在一起唱“记得当时年纪小”呢？



# 郑贞文在吉山

邱其永

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推荐郑贞文为福建省政府委员，1934年省政府主席陈仪任命郑贞文兼任教育厅厅长。1942年，陈仪调任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林森又于1943年逝世，因而郑贞文不久便被免去了省政府委员和教育厅长职务。其后他接受陈仪的邀请到重庆担任国民党党政考核委员会第五室主任，主管文教，但仅任职四个月就因病回闽，在省政府里挂了个顾问的空衔。

郑贞文任教育厅长前后约10年，其中自1938年至1943年在战时省会永安6年。在这段时间里，他能紧密联系抗日战争形势，通过学校教育工作和其他各种形式，开展抗日爱国教育，提高在校学生和城乡广大民众爱国思想认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郑贞文即部署沿海各县学校疏散，还支援外省学校迁闽。1938年5月，郑贞文率领教育厅公务员内迁永安，将厅址设在距城区十华里的吉山乡，因陋就简，选定刘氏大宗祠做为办公地点。在祠堂门口两边墙壁上刷上白色的“顶天立地，继往开来”八个大字，很是引人注目。后来，在办公厅左边的山麓古树下，新盖起一座厅长办公室，是原松木和毛竹混合结构的平房，简朴幽雅，与吉

山传统的砖木庭院大异其趣。郑贞文给这座办公室取名“笠剑轩”，以示提倡“笠剑学风”之意。就在这个办公室里，郑贞文通过省政府命令全省高中及大专学校二年级以上男生担任战时民众教育工作，花一个月时间集中他们在福州培训，然后分配到各县担任训练民众工作。在结业典礼上，陈仪发给每人斗笠一顶，佩剑一柄，剑鞘上刻有“成功成仁”四字。郑贞文向全体结业学员倡导发扬“笠剑学风”，要他们头戴斗笠，身佩剑刀，深入农村发动民众参加抗日，为抗战胜利创办民校，扫除文盲，改良社会风气，反对醉生梦死生活，树立艰苦朴素作风。

原设在福州的义务教育实验区，于1938年迁到永安大湖。郑贞文委派省教育厅视导员茅乐楠为实验区主任。茅乐楠是沙县人，通永安方言，且与永安教育界中的许多人士交往甚密，很有利于开展工作。他在大湖办了中心小学，又先后在魏坊办单级小学；在坑边、湖峰等村办了工读小学和简易小学，进行义务教育实验工作。后来，教育厅决定将义务教育实验区改为国民教育示范区，由永安师范学校兼办，以师范应届毕业生分配到全乡各国民学校实习，负责扫盲教学，普及义务教学，宣传抗日。当时大湖为全县义务教育最普及的示范乡。

1939年，永安县教育科全面推行战时教育，曾在城关大巷李宅（今百合商场处）开办战时民校师资训练班，抽调每所小学教师各一名参加训练，学习有关战时教材，回校后从事战时教育，招收成人、妇女就学。7月，全县56所简易小学一律改为国民学校。1940年2月，各乡镇的完小改称中心学校，并在校内增设民教部。永安县政府还培训了一批劝学员，分配到各乡镇劝导督促成人、妇女，学龄

儿童入学，把各村国民学校办好。郑贞文曾撰写赠言送给各校，勉励教师，他的赠言是：“具慈母心肠，运良师手腕，立士人气节，做学子楷模。”

1938年，省教育厅在吉山创办省立永安中学，聘请留美博士林天兰担任校长。创校之初只开初中四个班，学生119人，教职员工12人，许多课程都由教育厅学者兼教，教学质量很高，是当时我省著名的一所中学（永安中学已发展为今天省重点中学永安一中，建校已过50周年）。同年，福州实验小学迁来永安，改称省立永安实验小学，直属教育厅领导。郑贞文在吉山开办了实验小学分校，校址就在“笠剑轩”的左边，可谓得天独厚，条件比别处小学优越。该校纪律严明，教学严格，考试要求与实验总校同等，成绩优良，附近各乡村农民也把自己的子弟送来此就学，并引以为荣。在此时间，郑贞文还举办了壮丁夜校，按保甲设点，由警察动员壮丁入学读书，提高壮丁文化知识和思想认识水平。为促进民众教育发展，郑贞文还在吉山创办民众教育馆，馆内有图书室、阅报室、娱乐室，全日对外开放，是男女民众学习娱乐的好去处。除此还有儿童游艺园，设秋千、木马、滑梯、爬杆、翘翘板、乒乓球、积木、沙盘、幻灯等等，是最受少年儿童欢迎的活动场所。

郑贞文在吉山，能密切联系农民大众。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特别与其住房附近的老百姓，更为亲近友善。郑贞文非常尊重吉山的乡规民俗，他曾送给吉山刘氏大宗祠牌匾一块，粉白底，雕暗绿色“明德惟馨”四字，博得乡民的好感。每年群众举行各种民间灯会，他和教育厅公务员也愿与民同乐，每当旱船、高脚戏、龙灯、烛桥、花灯游至教育厅和“笠剑轩”门前表演时，他们都燃放鞭炮表示欢迎，热闹

非常。教育厅放映电影也免票接待男女老少观看。教育厅公务人员缺乏住房，老百姓主动挤出房间让他们居住，不收租金，融洽相处，亲如一家。

郑贞文原是留学日本专攻化学的，学成归国，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理化部编辑，后升任理化部部长，著译甚丰。他的文学造诣也极深，在吉山任厅长期间，他编辑出版了《闽贤事略初稿》、《笠剑留痕》诗词集，《郑所南谢翱羽诗文年谱》。他还介绍了郭沫若翻译的歌德名著《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来永安东南出版社出版；郭沫若著作《先秦学说述林》也在东南出版社首次发行，成为当时永安的畅销书，博得知识界的普遍欢迎。

郑贞文在吉山还曾组织过诗社，举办过折枝诗联环唱活动，以诗会友，团结一批古体诗词宿将和青年诗词爱好者，对推动永安诗词创作与理论探讨，起了一定的作用。

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郑贞文积极创作抗日歌词，宣传抗日救国，为改革学校音乐教学和课余歌咏活动提供了教学材料。如《保卫福建》、《福建青年》、《收复金门》、《战地歌咏团团歌》等等，歌词由作曲家蔡继琨、邓锦屏等谱曲，都是当时普及全省城市农村，为广大群众，尤其是爱国青年欢迎的抗战歌曲。时至今日，我们还能熟记这些歌词，如《保卫福建》的歌词是：“福建是我们的家乡，一千三百万的斗士，守着这十二万方公里的地方。敌人来吧！杀！把铁血安定我闽疆。瞧！那蜿蜒的江水，崎岖的山脉，正等着吮吸敌人的血肉，可别想在这里有半点儿猖狂！来吧！我们一千三百万的斗士，不怕死，不怕伤，守着这十二万方公里的地方。保卫福建，保卫我们的家乡！”

（本文根据邓家煊提供的材料及参阅有关资料写成）

# 黎烈文在永安的七年

邓家焕

黎烈文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祖父任过台湾知府，父亲曾在福建做过官，堂婶黄松是福建泉州人，能书善画，对黎烈文有较大的影响。黎烈文中学毕业后，1919年底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为书记员，整理校对文稿，1921年在厦门大学校长室工作，1922年提升为商务印书馆助理编辑，得到《学艺》主编郑贞文的鼓励支持。郑贞文为黎烈文短篇小说《舟中》所写序言中写道：“余于民国八年识烈文于沪上，时烈文尚未成人，已自食其力，余尝悲其遇，重其才而惜未能深造也。”1926年得郑贞文资助赴日本留学，翌年转赴法国留学，因此他与郑贞文结下深厚交谊。1932年回国，先在法国通讯社上海分社工作，后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之聘，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1933年至1934年8月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130余篇杂文，后结集为《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出版。1936年1月他与鲁迅、聂绀弩等创办《海燕》文艺月刊，6月他与巴金共同起草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0月又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21人共同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八·一三”战争爆发后，黎烈文和茅盾、巴金合编《烽火》（初名《呐喊》），日军侵犯上海后停刊，他被迫回湖南老家。

1938年春黎烈文由郑贞文推荐到福州，任郁达夫公报室编辑和教育厅视导员，1938年5月随省府迁来永安；1939年在永安由陈仪任命组建改进出版社，4月黎烈文创办《改进》综合性文艺半月刊，并亲自兼任主编，至1945年11月整整在永安七个多年头。现将其在永安活动的主要情况分述如下：

### （一）黎烈文与郑贞文、陈仪的关系

黎烈文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与郑贞文同事，受到郑贞文的赞赏，在他鼓励下写了《保姆》、《舟中》、《觉悟者之末路》等小说，显露出一个青年作者的文学才华和特有风格。从此他俩结下了情谊，当黎来福建省教育厅时他曾将鲁迅生前书赠黎烈文的“德国的孩子们饿着”是珂勒惠支亲笔签名的，有鲁迅手笔的画转赠给郑贞文。

黎烈文在主编《申报》副刊时，鲁迅说过：“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谈’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上面去驰骋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是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从这些话里可知黎烈文与鲁迅对杂文提倡的看法与交谊。

陈仪是鲁迅留日的同学，又是同乡，回国后虽各走各的路，但私交很不错。他很尊敬鲁迅，在永安时曾出资预定鲁迅全集卅部，以支持全集出版，出版后将鲁迅全集分赠有关单位。陈仪知道黎烈文在上海与鲁迅的交往，因而予以支持信

任，聘请他在永安组建改进出版社，当然这也体现了陈仪建设新福建的施政方针

## （二）黎烈文和改进出版社

1939年2月黎烈文奉陈仪令组建改进出版社。他在《改进》发刊词《我们的希望》一文中，说出了他创办《改进》的决心和目的，“创办刊物犹如推重车上峻坂，在永安这个万山重叠，交通不便，风气闭塞，不单外省人不知的贫瘠山城，连福建本省人，说起它来也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出版刊物何等困难。我们是抱着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苦心，不顾人力物力困难，创办这个内容比较广泛的刊物，盼望刊物出世后，能引起各处文化界人士，对这地方的注意，能够有更多的人到这里来耕耘、垦拓、慢慢地成为一个推动内地文化的据点。刊物内容是想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有些许贡献。”由于陈仪主政比较开明，当时省会永安就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局面，在此形势下，黎烈文经过二年多的努力，改进社先后办了六大期刊、八大丛书，现简述如下：

《改进》半月刊：创办于1939年4月，1941年5月改为月刊，是改进出版社有代表性的综合刊物，主编黎烈文，共出13卷4期，计112期（其中二期合刊七次），1946年7月停刊于福州。

《现代儿童》：原系省教育厅主办，1939年9月由改进社接办，出版新一卷一期，连续出版110期（其中福州出版9期），1946年7月15日终刊于福州。

《现代青年》：原系省教育厅主办，1939年11月由改进社接办。从新一卷一期出至七卷二期止，于1942年12月15日停刊。

《战时民众》：1938年10月由国民党军训处编印，出12